

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

——明清历修《赣州府志》对赣南民风的表达

李晓方

摘要: 民风是各类地方志都会涉及到的普遍话题。在明清历修《赣州府志》中, 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是两幅主要的民风图景, 这两幅图景既是地方志作者对赣南民风已然世界的白描, 也是对赣南民风应然世界的期待。地方志对民风描写及诠释的微妙变化, 既映射出地方社会治乱环境的变迁, 更标示着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精英与民众以及土著与移民之间的诸多权力关系和利益诉求, 具有多元话语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 规限着地方志在对地方民风做某种程度客观呈现的同时, 又要做符合特定利益关系的建构。

关键词: 地方志; 话语权力; 崇文; 尚武; 赣南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0)04-0149-11

作者简介: 李晓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副教授 (上海 200241)

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升温, 地方文献受到了空前的青睐而倍受征引。不过, 在具体的研究中, 对地方文献的取舍受制于主体意义的预设而缺乏必要的文本批判, 又往往造成研究者对学术追求的不自觉偏离。值得称道的是, 新近涌现出一批试图将地方文献分析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即将地方文献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解读, 探究其形成过程以及由此映射出来的地方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 这代表了区域研究的新动向¹。受启于这一研究理路, 本文将以前清历修《赣州府志》为文本^④, 分析它们对赣南民风中“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的表达及其变迁, 并将之置于谁在编方志、谁在看方志和方志是怎样编成的等问题意识的视野下,

收稿日期: 2009-11-12

* 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8年)规划项目“赣南客家地区的习武风尚研究”(项目批准号: 08LS11)的阶段性成果。

¹ 反映这一研究动向的主要成果有: 谢宏维:《文本与权力: 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刘永华:《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 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钱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历史授权——萧山湘湖史上的〈英宗敕谕〉》,《史林》2004年第6期;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明清历修《赣州府志》, 而没有使用同属赣南地域范围的《南安府志》, 主要出于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 考虑到方志版本的完备性, 这样将更有利于对地方志关于赣南民风的表达作历时性的分析; 其二, 历修《南安府志》关于民风的表达因袭多于创作, 较难藉以看到其中的变化, 研究价值相对更小。

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境和地方志的文本语境加以解读,以探求规限地方志表达区域民风的内在机制¹。希望本文的研究,对于学界进一步思考“如何批判”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志能有所补益。

—

民风,是对某一区域内基于独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或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民众风俗的概括与描述。民风有阶层、阶级、年龄、性别的差异,它作为一种习俗文化,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延续性,具有“长时段”的性质;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可能发生剧变而表现出突变性和断裂性,因而又具有“短时段”的性质。自古以来,人们尤其是当政者对各地民风及其不变就表现出了高度关切。在传统文化的视野下,体察地方民风习俗实乃推行王道教化的基点,即所谓“观民设教”^④。在文献古籍中,关于体察民风重要性的言论可谓渊源有自,皇皇大观。具体到史学领域,对于民风的概括性描述,亦可以追溯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左传》等经典史著。本文将讨论的地方志关于民风的表达,正是这一悠久文化传统和史学传统的发展类型。

赣南位于江西省南部,是明清时期江西南安、赣州二府和宁都直隶州的辖地范围,也就是当年的“南赣地方”、今日的“赣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和族群构成、民情风俗,以及近世以来发生的种种变故,赣南已经成为地域社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区域。为便于作历时性考察,并考虑到方志版本的完备,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明清历修《赣州府志》。明清时期,赣州府共八修府志,分别修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嘉靖十四年(1536)、天启元年(1621)、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五十二年(1713)、乾隆四十三年(1778)、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同治十二年(1873)。除正德府志亡佚外,其余七部均有版本流传至今。由于宋元以前的赣南方志均已失传,故明嘉靖十四年(1536)《赣州府志》已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地方志对赣南民风的描述,最早也就只能追溯到这部府志的记载。

概览嘉靖《赣州府志》(以下简称“嘉靖志”)关于属辖10县民风的表述^④,将强烈地感受到其对属辖10县民风的表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可从对每个县的描述中撷取一个关键词凸显出来,依次是:“人物伉健”、“易生喜怒”、“疏于礼节”、“刚悍劲险”、“嗜勇好斗”、“伉健难治”、“勇而喜争”、“民性悍勇”、“轻生好斗”、“民俗桀骜”等等^{1/4}。面对如此强势的文本,赣南“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将自然浮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这幅图景的主要元素是赣南民众体魄强健、气劲喜争、勇而好斗、崇尚武力、桀骜难治。

但是,尚武好斗之风并未涵盖四民之首的士。嘉靖志对士风另有一番描述,“唐始有士,宋始有名士”、“士知向学”、“崇尚家礼”、“力本右文,士多尚学”、“士知务学,无浮靡习”、“士性敏而欠学”。这些词句,让我们隐约看到了赣南民风中之士风的面向:崇文向学。嘉靖志充分肯定赣南自唐宋以降士民渐知教化,能崇尚国家正统儒学。只不过,这一士风面向在上述强势文本的比照之下不甚显眼。

天启《赣州府志》(以下简称“天启志”)一改嘉靖志分述各县民风的手法,转而通论全府,行文十分简略。曰:

¹ 梁洪生、钱杭在中国族谱研究中分别提出了“谁在修谱”与“谁在看谱”的经典式问题,这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具体参见梁洪生《谁在修谱》,《东方》1995年第3期;钱杭:《谁在看谱?——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个问题》,收入王鹤鸣编《中华族谱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周易注疏》卷4四库全书本。

^④ 明嘉靖时期,赣州府下辖10个县,分别是赣县、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宁都、瑞金、石城、龙南。随后赣州府属县情况前后有所变化,具体如下:万历三年,析安远县双桥、石溪等十五堡设长宁县,隶属赣州府;隆庆三年,又析安远、信丰地增设南县,同隶属赣州府。至是,赣州府属县由明初的10个增至12个。清乾隆十九年后,从赣州府析出宁都县设宁都州,并将瑞金、石城二县划归为其属县。这样,赣州府属县减至9个。光绪二十九年,析龙南、信丰地设虔南县,隶属赣州府,至是,赣州府属县又增至10个。

^{1/4} 嘉靖丙申《赣州府志》卷1《地理·风俗》

所称故俗之悍劲伉健，犷讦好斗喜争，则以异时方隅多垒，其人日讲戈矛征战之事，久而相沿，无足怪者。¹

尽管天启志作者在此并不讳言相沿已久的赣南尚武好斗的事实，但是，他们更想表达的不是指出这一民风，而是要对这种民风实乃缘于地方多乱以作“合情化”的解释。这一颇具避实就虚意味的回应方式，加上对大量相关材料的删削，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嘉靖志所描绘的那幅赣南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与删削大量尚武民风材料相反，天启志将自唐宋以来赣南籍诸如钟绍京这样的前贤名流请将出来，构建起一条延绵不断的文人学子的谱系，使得嘉靖志中那幅原本黯然失色的崇文向学的民风图景变得鲜活起来^④。

而修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则采用明清地方志通常的做法，通过导入过化是邦的名宦硕儒（如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与地方人文兴盛关联的构建，将赣南崇文向学的士风图景变得更加亮丽照人。但是针对下层民风，康熙志话锋一转，指出了赣南“不可推移”的强悍之俗和“蛮蛮之习”。随后，康熙志进一步批评道，赣南虽为历代先贤过化，而真正能恪守儒家正统礼教的，仅限于极少数的士大夫家族。即便是较易推行的冠礼，“赣诸邑中，颇闻雩都缙绅家有一二行者”。至于较难推行的其它各种礼仪，有悖正统礼教之处更是其主流，如府志谈到“赣俗信巫，婚则用以押嫁，葬则用以押丧”、“接亲则遣子弟以往，于礼混矣”、“各邑书旌吊问，皆张筵设鼓吹，已为非礼”、“今或以形家言数改其葬，使已腐之形，时时见人，无礼甚矣”。在康熙志的描述中，赣南似乎也不太注重教育，说“古人三冬学足，十二邑虽勤惰不齐，而延师鲜有终冬者”。至若“俗固好讼，而坟墓之讼过半”、“其拳勇驰逐，遇事风生者，更为良民之蠹”^④。这样，被天启志模糊处理的那幅尚武好斗而不知礼教的民风图景再次清晰起来。

时隔六十余年后的乾隆《赣州府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对赣南民风的论述大体上采用了总分结合的手法，即先总论一府风俗，然后分述各县情形。透过乾隆志的表达，不难发现尚武好斗的民风在当时的赣南依然存在，如龙南、会昌、兴国、安远4个县分别被指称为“任侠好斗”、“喜争好斗”、“挟气上斗”、“轻悍而争斗”^⑤。不过，较之康熙志对赣南尚武好斗民风的严厉批评，其程度明显减弱。这也体现在它对赣南民风的总论中：

赣州府风近闽粤，而人抗志厉节，有勇好斗，轻生敢死。其风俗笃厚而纯一，其人物秀特而节，概唐书宰相世系已有赣人。士知向学，民颇迁善。所不足者，俗健工巧，好佛信鬼巫师角术，时有剪扛之患，甚至婚则用以押嫁，葬则用以押丧。^⑥

上引文第一句话讲下层民风，第二句话讲士风，第三句话讲士风、民风的总体趋向，第四句话指出民风中存在的不足。这四句话又可以以“所不足者”为标界，将前后文分为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肯定赣南人文风俗之可美的方面，并通过“人物秀特而节，概唐书宰相世系已有赣人”的表达，呈现出了赣南崇文向学的民风图景。第二层意思是指出赣南风俗中有待教化的不足之处。按这一行文逻辑，府志作者似要将赣南“有勇好斗，轻生敢死”的民风做前所未有的首肯。尽管这恐非作者本意，但这一似是而非的评论却透露出作者并无意对赣南尚武好斗之风作严厉批评；或者说，在作者看来，尚武好斗已非赣南民风之大弊了。

然而，时至道光《赣州府志》（以下简称“道光志”），在充分肯定“士知向学”后，赣南尚武好斗的下层民风再次成为府志作者严厉批评的对象。被指称为尚武好斗的县域由乾隆志的4个增至6个。更耐人寻味的是，在《风俗志》的末端，府志作者采用隐喻的手法，特别新增一

¹ 天启《赣州府志》卷3《舆地志·土俗》

^④ 天启《赣州府志》卷3《舆地志·土俗》

^④ 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卷63《志事·风俗》。

^⑤ 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风俗》

^⑥ 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风俗》

按语云:

地险俗悍, 五方杂处, 染侨户蛮蛮之习。旧志云, 尔学使仁和赵佑题试院楹联云: “地是虎头州, 端藉诗书锁武健; 春生麟角馆, 还资法律济宽仁。”此语于今日尤切。¹

在作者看来, 武健民风在当时的赣南已是一种“不得白”而亟待通过崇文重教加以更化的最大敝俗^④。这样, 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在继乾隆志稍有淡化后, 再次强势地凸显出来。

二

通过梳理明清《赣州府志》对赣南民风的描述, 我们清楚地看到: 第一, 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是历修府志所呈现的两幅主要民风图景, 它们构成了历修府志表达赣南民风一以贯之的主线; 其中, 崇文向学主要是指称士绅阶层, 而尚武好斗则主要是指称除士以外的下层民众。第二, 这两幅民风图景的强弱程度在历修府志中有所变化, 相对而言, 尚武好斗民风图景的变化尤为明显, 其变化轨迹大致是: 嘉靖志极强, 天启志明明显淡化, 康熙志再度加强, 乾隆志有所减弱, 道光志复又加强; 此外, 各府志对尚武好斗民风成因的诠释也稍有差别。第三, 从总体上看, 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在历修府志中较之崇文向学的民风图景更为凸显; 除天启志对尚武民风作有“合情化”解释而稍显暧昧外, 其余府志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作有待教化的敝俗。

我们要追问的是: 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何以成为明清《赣州府志》着重呈现的民风图景? 府志作者又何以将尚武好斗的民风全然归咎于除了士绅精英阶层以外的下层民众, 史实是否果真如此? 又是什么导致了尚武民风在历修府志中强弱程度的变化和不同的诠释? 这又映射出了赣南地方社会的什么历史内涵?

事实上, 修文与尚武是所有地方志类作品都会涉及到的普遍话题, 而且价值判断也并无太大差别。然而, 它们在赣南历修府志中竟成为表达其民风面貌的两大关键词, 这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 若从明清时代赣南的历史情境出发, 概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首先, 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是历修赣州府志的作者对赣南民风实态的描写。尽管我们可以质疑方志描述与民风实态的吻合程度, 毋庸置疑的是, 纂修一部信史也正是大多方志作者的理想追求。嘉靖志的主纂董天锡说: “郡之有志, 犹国之有史也。史家纪载有凡例, 褒贬有定法, 足以传信垂戒, 乃谓之良史。”^④为使康熙志的纂修彰显实录精神, 江西巡抚郎廷极对其主纂人选可谓颇费思量^⑤。康熙志亦声明其纂修原则: “信史贵乎实录, 故无取泛词褒美。”^⑥更为要紧的是, 如果我们稍事爬梳赣南地方文献, 就会发现有足够多的史事可以用来支撑这两幅民风图景的构建。比如尚武民风, 就可以从发生在明清时代大量的动乱中得到证明。据黄志繁的统计, 明代赣南发生动乱 102次, 平均不到 3年就爆发一次; 清初(自顺治二年至康熙五十二年)发生动乱 54次, 几乎每年爆发一次^⑦。清中叶以后, 赣南成为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活动的重灾区^⑧。所有这些, 都足以给府志作者留下民风尚武好斗的深刻印象。在大多数府志作者看来, 尚武民风正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至于崇文向学的民风, 既可以像历修府志所做的那样, 从诸如赣南为历代先贤过化, 隋唐以降文教大开而代有人出的史事中得以建构; 也可以像现代史学工作者那样, 从儿歌童谣、民间故事与传说所反映的赣南民众对教育的重视中得到更为有力的说明^⑨。

¹ 道光《赣州府志》卷 20《风俗志》

^④ 道光府志在例言中对按语如是解释: “今仿张志所谓有不得白者, 不妨问一用之案语, 较切于总论, 每有辨晰, 即加案于后。”(参见同治《赣州府志》卷首《旧例·李志例言》)

^⑤ 嘉靖《赣州府志》董天锡《重修赣志序》

^⑥ 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卷 1《序·郎序》

^⑦ 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凡例》。

^⑧ 要说明的是, 相对实际发生的动乱, 这些数据并不精准而只是个概数。参见黄志繁著《“贼”“民”之间: 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 第 117—127、179—184页。

^⑨ 参见李晓方《清中叶赣南的会匪问题与政府控制——以〈清实录〉为考察中心》, 《史林》2008年第4期。

^⑩ 参见罗勇《略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 《寻根》2007年第5期。

其次,在官方看来,尚武好斗的民风对基层社会秩序和政府控制构成挑战而不可等闲视之,更化这一敝俗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倡导崇文向学。“犷悍难治”、“尚武好斗”的民风形象,至迟在南宋就已深深地镶嵌在了王朝话语之中。赣州历修府志据以描述民风的素材,大多正是出于诸如文天祥、杨万里、周必大、董德元、朱梦龙、朱敏等宋人言论。这些言论概因其作者身份地位的显赫,也因其往往彰显着王朝话语的性质,成为历修府志及府属县志乐于相互转引的话语。宋元以降直至明清,赣闽粤边界地区因动乱频仍倍受中央王朝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尚武好斗的民风既是赣南社会动乱在王朝话语中的反映,又是王朝话语对赣南社会动乱的原因分析。如南宋名将李纲在分析“虔寇盗贼”时就说:“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强悍,狃于为盗。”¹绍兴六年(1136),翰林学士朱震分析了“虔人弄兵”的二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越人劲悍”^④。王阳明在赣南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⑤的经典式感叹。明清赣南地方志的作者在分析地方动乱时,也基本上因袭了这一思维模式,将动乱之源归结到了人心与民风。如汤斌在重刊天启志的序文中说:“山僻俗悍,界四省之交,是以奸宄不测之徒,时时乘间窃发。”^¼乾隆志主修窦忻对赣南往日“人民戡激而猛烈,典郡者尤难其任”^½的叙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点。

如何有效地扼制俗悍尚武民风,使其不致于激起社会动乱,已成为宋元明清历代王朝一直在努力破解的难题。其举措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采取刚性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强力平息地方动乱和加强行政区划与基层组织建设并举的措施;二是采取柔性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推进教化。而地方志的纂修,实际上成为中央王朝推行教化,构建一统理念以及消解诸如赣南尚武好斗民风对王朝秩序潜在解构威胁的重要举措和手段。地方志作者在写作风俗志时,也颇有传统文化中“观民设教”的自觉,往往很愿意彰显这一教化目的,以体现地方志的王朝话语性质。如汤斌就说:“盖以为政,必先察其风谣,相其土宜,经理其山川,考正其贡赋。然后因地成化,随俗致理,至要也。”^¾当然,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纂修地方志以推行教化。对此,康熙志的督修陈良弼在与纂修张尚瑗讨论修志问题时就谈到,可以通过挖掘地方人文资源,建构文人学士谱系以激起乡民效法的榜样力量^⑧。其实,这也是大多地方志的惯常做法。

当然,榜样激励功能的发挥,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方能达致。地方志的读者最主要的群体之一就是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阶层。有基于此,康熙志尽管大肆批判赣南有悖正统礼教的民风,却仍然不忘将崇文向学的士风图景放置于风俗志的首端。这样,既呈现了地方历史人文概貌,又表达了对地方士绅阶层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当然,这幅优美的历史人文图景的呈现,在客观上又无疑暗合了地方精英构建良好地方形象的普遍追求。

不过,在对赣南尚武好斗民风的表达中,历修府志又无一例外地将地方士绅精英阶层与这种民风划清了界线。应该说,对民风的描述作士、民二分的区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但是,历修府志均将尚武好斗的民风完全归咎于下层民众,却又暴露出地方士绅精英的话语霸权。研究表明,自宋迨至明清,赣南大量的盗贼与动乱,来自下层民众的只占十分之二三,而来自地方精英阶层的豪杰则占据十分之七八^⑨。在中国传统社会,强大的官僚体制往往偏离其理想轨道,造成对游离于体制边缘的下层士绅利益的偏废,导致一般的生员往往不如县府的吏员。在明清时代的赣南,“入儒门不如入公门”^⑩的价值取向在民众中颇具市场,下层士绅成为反政府

¹ 李纲:《论虔州盗贼札子》,同治《赣州府志》卷65《宋文》。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绍兴六年六年辛酉。

^⑤ 《王文成全书》卷4四库全书本。

^¼ 汤斌:《重刊赣州府志序》,天启《赣州府志·序》。

^½ 乾隆《赣州府志》卷首《序文》。

^¾ 汤斌:《重刊赣州府志序》,天启《赣州府志·序》。

^⑧ 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卷1《序·陈序》。

^⑨ 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3页。

^⑩ 天启《赣州府志》卷3《舆地志·土俗》。

的力量之一不足为奇。因此，如果说尚武好斗的民风表达符合赣南民风实态的话，那么，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阶层自然也就难辞其咎。然而，历修府志的作者不仅没有给士绅贴上一张“尚武好斗”的标签，相反却给他们戴上了一顶“士知向学”的高帽。究其原因，首先，对士风的正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内核。在任何地方社会，必定存在倡导和实践正统礼教的地方士绅精英，他们通过获取功名并纳入王朝体制，成为王朝体制及正统礼教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能与王朝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地方精英，正是王朝话语首肯地方士风的主要依凭和道德表率，当然也是地方政府藉由推行王道教化的主要抓手¹。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主要是因为地方志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以士绅为首的地方精英之手。地方士绅精英既是地方志的主要读者，也是地方志的主要作者。即便个别府志的主纂人员并非赣南人士，但是，这些非赣南籍的主纂在府志编纂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必须依托赣南籍的精英们开展工作。以康熙志为例，其主纂是吴江张尚瑗，府志“姓氏”表明，实质性地参与了府志纂修过程的还有来自赣州府属各县的“参辑”25人，其中举人4人、贡生6人、生员12人、布衣3人^④。这些作为地方精英的“参辑”人员，他们的意志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府志主纂的编纂工作，这是不难想见的。同样地，尽管成员中有“布衣”3人，但所占比例极少，他们能否在地方志中发出“布衣”的声音，值得怀疑；此外，这仅有的3位“布衣”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布衣”说话，恐怕亦不宜过高估计。因此，大多连地方志为何物都不甚了了的下层民众，最终成为在传统观念中并不光彩的民风敝俗的主要“买单者”，实在是不难预料的结果。与此相反相成的是，府志编纂群体构成的上述特点，又为士绅精英们构建崇文向学的士风形象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

尚武好斗民风图景的强弱变化以及对它的成因诠释在历修府志中的差异，或许可以从纂修府志时的社会环境、府志编纂的一般程序以及府志作者的主体意识等角度进行解释。

嘉靖志对赣南民风尚武好斗的表达是历修府志中最为突出的。嘉靖志始修于正德丙子年（1516），后历经20年和11任赣州知府，于嘉靖丙申年（1536）得以付梓刊刻^④。与这次府志纂修过程相伴的是，赣南地域社会历经了一场空前的征战与厮杀。仅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的六年期间（1516—1521），在赣南就先后剿灭了“大帽山贼”、“三巢贼”、“浏头贼”、“郴桂寇”等难以数计的动乱。在这样一段血雨腥风的日子编纂地方志，最终给我们呈现出一幅极强的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实在情理之中。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必将影响到府志作者对地方民风的体认和判断，进而又必将影响到府志作者对建构地方民风素材的选择。以兴国县为例，嘉靖志征引的是宋代朱梦龙的言论“刚悍劲险，尚气喜争”；却没有选择同样进入了府志作者视野的文天祥的言论“来游来歌，被服儒雅”^⑤。

还必须注意的是，嘉靖志的纂修署名董天锡，董氏宁都县人，弘治丙辰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中、山东转运使、四川参政和南京大理寺卿等职。据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因董氏耻附新贵，年仅五十四便引疾求退。嘉靖己亥（1539年，即嘉靖志刊刻后三年），得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许瓚的举荐，复起南京大理寺卿^⑤。据此可知，董氏出任嘉靖志的纂修，正是在其仕途受挫而伺机复出的乡居期间。因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其心思投入到府志的纂修中，值得质疑。王世芳在《嘉靖庚寅志序》中也提到，董氏只是做了“裁决”的工作，其“裁决”的基础则是由受聘于前赣州知府刑珣的福建长汀人李坚初步完成，并经由继任赣州知府的罗辂和张

¹ 参见李晓方《明清时期赣南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④ 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卷1《赣州府志纂修姓氏》。

^⑤ 王世芳：《嘉靖庚寅志序》，天启《赣州府志·序》。

^⑥ 文天祥：《安湖书院记》嘉靖《赣州府志》卷11《艺文》。

^⑦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2《人物志·名臣》。

汉修改的底稿¹。因此,嘉靖志中关于赣南风俗的素材,恐怕主要是来自上述相关人员的采集。不过,风俗志首端对赣南尚武民风成因的分析,则估计与董氏的“裁决”有关。用“气化盛衰”的理论较之文天祥“去南渐近”的理论来诠释赣南的尚武民风,似乎更照顾到了赣南地方精英们的乡梓情结。

赣南剧烈的动乱一直持续到嘉靖年间,万历以后稍趋安定,尽管期间亦偶有发生,但其殃及面及破坏程度已远逊于前。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天启志,也难怪其主纂谢诏对赣南“异时”的“戈矛征战之事”已颇有隔世之感。天启志模糊赣南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应该与这一客观历史背景有关。这点也可以从作者将此民风归因于过去战乱频仍而相沿成俗的诠释中得到说明。要特别指出的是,天启志将嘉靖志的尚武好斗民风素材全部删削出局并作有“合情化”的解释,以及努力强化对崇文向学民风的构建,或又反映出府志作者暗含的地方情结。尽管尚武好斗的民风敝俗并非针对地方精英而言,但是,除了地方精英,地方志毕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读者群,那就是省志和全国一统志的编纂人员。在明清制度化修志的背景下,府州县志实乃省志和一统志的辑史来源。在很大程度上,省志和一统志对地方形象的构建,往往取决于地方府州县志对自身形象的构建,地方志的作者对此必定了然于心。因此,每部地方志都会存在程度不一的地方情结,只不过天启志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缘由,首先概因府志纂修主要是出自赣南籍人谢诏一人之手。天启志《修志姓氏》表明,该府志设有主修、同修、协修、纂修与考辑。其中“主修”1人,为赣州知府余文龙;“同修”4人,分别是赣州府同知1人、通判2人和推官1人;“协修”12人,分别是府属12个县的知县;“纂修”为郡人谢诏;“考辑”2人,分别是金汝和与彭森^④。这两位同是赣南籍的“考辑”或实质性地参与了修志过程,那么,另外那些“主修”、“同修”与“协修”人员是否可能参与了府志的具体编纂呢?谢诏在府志序言中说:

万历间,郡大夫有议及此者,曾两开局,未睹其成。丙辰之岁(1616),兰阳李公以司权别驾摄郡篆,重有意焉,而谬属予以笔札之役。予谢敏而,而公意称笃。会长洲金公来为守谋,与公合则再四赴之。予乃键关穷咎,取各邑新旧牒,稍为编次。既成帙,惴惴不称度之案头者久之。已而两公俱以迁秩行事,亦旋寝。司农伍公后至,尝受李公托,数过山房,索予志藁甚亟,予逡巡出而请正,公即携去。今春督漕纲赴省会,遂命书掾缮写成部,归而进之堂长余公。余公不鄙,辄付梓。人既为区处,其费而一切鸠匠供饷,更以烦司储,朱公凡越四月杀青。^④

很明显,在主修余文龙到任之前,谢诏通过“键关穷咎,取各邑新旧牒,稍为编次”,府志底稿业已编纂完毕。余文龙及同修、协修人员的主要贡献是为该府志付梓提供了经费支持。在刊刻之前,余文龙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所以,天启府志受官方当局的介入甚少,这就为府志作者的意志展现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其次,府志主纂谢诏的家乡情结比较浓重。谢诏,字彦实,号凤渚,赣县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四川颖州知州、刑部侍郎分巡四川监军。在任期间,平定地方叛乱有功,万历皇帝赐其绯鱼二品服,诏不受赏,连章乞休。后屡起湖广、四川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及巡抚顺天,凡六起用,皆未赴任。著编有《玉房山集》、《虔台志》等^⑤。天启《赣州府志》是谢诏告老还乡后编纂的。在天启府志中,谢诏的家乡情结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他为赣县争取历史名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上文提到的唐代中书令、越国公钟绍京,嘉靖志认定其为兴国县人而入传“贤达”。但因考虑到兴国县在唐代隶属赣县,至宋太平兴国七年才从赣县析出置县,故嘉靖志的作者特别为其籍

¹ 王世芳:《嘉靖庚寅志序》,天启《赣州府志·序》

^④ 天启《赣州府志·修志姓氏》。

^⑤ 谢诏:《重刊赣州府志小叙》,天启《赣州府志·序》

^⑥ 同治《赣县志》卷32《人物志·名臣》

贯作有如下说明：“在唐为赣县人，宋割地置县，隶兴国。”¹ 做这种处理，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这样既表明了钟绍京的出身地是在纂修府志时的兴国县，又指出了钟氏的出生地在唐代隶属赣县的历史。当然，府志作者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相对客观公允的态度，或与钟氏县域籍贯与嘉靖志主纂董天锡没有任何瓜葛有关，董氏是宁都县人。然而，谢诏在天启志中却将钟绍京的籍贯由兴国县改归赣县，记曰：“钟绍京，字大可，赣县人，生于清德乡。”^④ 出于同样的原因被谢诏从兴国改归赣县籍的还有北宋官至殿中侍御的王奇^⑤。应该承认，类似兴国与赣县此类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的确会给后人修志时确认前人籍贯造成麻烦。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同一人物归入不同的籍贯。然而，像谢诏那样敢于推翻旧志的定案去触犯修志家之大忌，倘若没有足够强烈的家乡情结是不易做到的。谢氏强烈的家乡情结，或与人们普遍存在的“落叶归根”的老年心理有关。正因为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加上府志主纂的上述两个特点，最终使得天启志中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相对嘉靖府志大为减弱，成为历修府志在描述赣南民风方面地方话语性质最为浓重的一部。这番地方情结的表达，恐怕主要是针对未来的省志和一统志的编纂者以及除了地方人士以外的可能读到该地方志的“他者”而发的。从这层意义上，地方志既是王朝推行教化和构建一统理念的载体，又是地方精英籍以构建地方形象的平台。

与天启志相反，康熙志再次将赣南的尚武及有悖正统礼教的民风凸显出来。明末清初，赣南地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接纳了大量来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1/4}。入清以后，赣南土著与闽粤移民围绕着租佃的斗争此起彼伏，这种状况至乾隆中期以后才渐趋平息^{1/2}。康熙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纂的。它对赣南尚武民风图景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矛盾斗争的反映。在康熙志诠释赣南尚武好斗的民风时，将之归结为“粤闽侨居”“蛮蛮之习”的感染。这一方面反映出在闽粤移民与赣南土著的斗争中官方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表明，闽粤移民与赣南土著间的斗争对府志作者描述赣南民风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康熙志对赣南有悖正统礼教的陋俗，做了较之其它府志更多的披露和更严厉的批评，这与该府志出自非赣南籍的张尚瓌之手不无关系。张氏不仅是称职的府志主纂，也是学养颇深的儒者。他治春秋之学，著有《三传折诸》四十四卷^{1/4}。因此，尽管张氏在主纂府志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地方士绅精英意志的制约，但是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和学养，使府志表达在最大程度上压缩地方情结、彰显实录精神和王朝话语成为了可能。

乾隆志中赣南的尚武民风图景，其程度较之康熙志有明显弱化。与此相对应的是，纂修乾隆志时期也是历修府志中赣南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时任赣州知府的窦忻，在为乾隆志作序时说：“赣郡于江西为枢府，宋洪迈谓其接瓯闽百粤之区，介溪谷万山之阻，民人戇激，最称难治。自宋赵清献，迄明王文成，历经抚驭，未靖伏戎。本朝重熙累洽，日月渐摩，我皇上明目达聪，光辉远被群生，濡澍固已化刚悍杰黠之气，咸即醇良矣。”^⑧ 尽管这段说辞具有歌功颂德的意味，却也流露出在相对安定祥和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官员对辖区民风看法的改观。这也正是乾隆志尚武民风图景弱化的主因。府志转引会昌县志对尚武民风的原因分析，又映射出前明为防御“闽粤盗寇”犯境，一度曾大兴团练乡勇的历史事实及其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历史记忆^⑨。

乾隆志是一部被批评为“义例不精”^⑩的作品，这点也确实体现在它对赣南尚武民风似是而非的批评中。此外，它对赣南尚武民风亦缺乏像其它府志一样的诠释而表现出府志作者主体意识

¹ 嘉靖《赣州府志》卷10《人才·贤达》。

^④ 天启《赣州府志》卷16《乡贤志》。

^⑤ 嘉靖《赣州府志》卷9《选举志·荐辟》；天启《赣州府志》卷15《选举志·荐辟》。

^{1/4} 参见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

^{1/2} 参见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9 四库本。

^⑧ 乾隆《赣州府志》卷首《序文》。

^⑨ 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风俗》。

^⑩ 道光《赣州府志》卷首《李本仁序》。

的缺位。赣州知府窦忻在府志序言中透露的修志细节，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何以出现这种状况。窦忻说：

分宜林君有席前领吉安志，义例娴熟走币，延主其稿，佐以新建孝廉杜君夔、府学刘教授谦、刘训导钦谟并襄赞之。今春仲开局，八阅月稿脱。林君参旧志新编为发凡十六则、卷十六总目，虚公熟商，而后援笔。于是杜君任赋役、军政、图考。教授任学校、名宦、寺观，训导任建置。两人兼任人物、列传。自天文、地理、山川、秩官、选举、封爵、列女、艺文、杂志，皆林君领之。每一稿成，诸君辨讹订舛，补缺删繁。¹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得知，乾隆志中关于赣南民风的论述，正是出自府志主纂林有席之手。临江府分宜县的林有席，此前曾任《吉安府志》主纂，号称娴熟方志义例。林氏这一颇似职业修志家的身份，大异于此前三任赣州府志主纂。董天锡与谢诏，是为地方精英代表；张尚瑗则为颇具赣南地方知识的府属兴国县知县。他们出任府志主纂的主要动力，或出于乡梓情怀，或为了掌握地方话语权，或出于政治责任感的历史使命感。林氏出任乾隆志主纂的主要动力，自然与此无涉。当然，林氏或是出于对方志事业的热衷，或是出于留名后世的追求，或是碍于朋友之请，或是所有这些都兼而有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林氏之出任乾隆志主纂是基于一定利益回报的合同关系。以林氏为首的一班缺乏地方知识的职业编志人员，其编志过程太像方志学家章学诚所批评的那样，“启局杀青，不逾岁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④，而且大多工作也只是局限在技术性的“辨讹订舛”和“补缺删繁”。即便如此，仍留下不少“兼多舛误，甚或星图易位”的硬伤，遭到后世方志家的批评，更遑论做到义例精当的深度分析。

与乾隆志相反，道光志却表现出了极强的主体意识，它在风俗志的末端通过援引一首楹联并加按附志的形式，将赣南民风尚武的图景再次凸显出来。道光志主修李本仁的一段话，将有利于我们理解此点：

遂不揣奔陋，积数年之采辑，至 末夏甫集。事值长宁会匪案，亲往搜捕，道所属各邑，复流览咨询于风土，得其刚柔之性也，……凡踪迹所历，辄志其略以备考订。寻又摄臬，事功未半而中辍，明年方以次续葺。旋膺皖江臬使之命，不获竣剖劄。昔文正刻而未修，其所刻者固可得而证也。本仁修而未刻，将所修者终不可得而见也。因携至南昌梓成之。^④

从上述引文可获以下信息：第一，纂修道光志时，也正值李本仁在赣南搜捕“会匪”之际；第二，作为府志主修暨分巡吉南赣宁道的李本仁，亲自参与了府志纂修的资料尤其是事关风土民情资料的采集。据此可以推论：首先，道光志对赣南民风尚武的表达是与期间的“会匪”活动相关的。事实上，清嘉道时期，赣南“会匪”活动的猖獗也引起了王朝顶层的高度关切，《清实录》中就有大量的报道^④。其次，道光志关于赣南民风的表达，受官方当局的介入很深。由此也就可以解释，虽然该府志的主纂也是赣南人，但是，我们从中却没能看到类似于天启志般的开脱与饰美。相反，在对尚武好斗民风成因的诠释中，所征引的反倒是更伤赣南士绅精英自尊的文天祥的话语：“山川之绸缪，人物之伉健，大概去南渐近，得天地阳气之偏，不可以刑威慑而可以礼义动”^④。文氏的言论，反映了其时普遍存在的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即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理空间越边远，泽被教化越少，文明等次越低^④。道光志藉此诠释赣南的尚武民风，反映了作者正是受制于这一思维模式，其实质是彰显正统理念的一套典型的王朝话语。

¹ 乾隆《赣州府志》卷首《序文》。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四《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页。

^④ 同治《赣州府志》卷首《旧序》。

^④ 参见李晓方《清中叶赣南的会匪问题与政府控制——以〈清实录〉为考察中心》，《史林》2008年第4期。

^④ 道光《赣州府志》卷20《风俗志》。

^④ 张文：《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四

综上所述，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是明清历修《赣州府志》呈现出来的两幅主要民风图景。在历修府志的表达中，尚武好斗主要是对应下层民众，崇文向学则主要是对应地方士绅精英。历修府志无不将士绅精英从尚武好斗这一传统视野下的敝俗民风中排解出去，而将之归咎于下层民众。这一方面反映出士绅精英牢牢地掌握着地方志的话语权，使得地方志在民风描述中具有浓重的精英话语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志暗含着下层民众的无语历史和地方精英话语霸权之间的对抗。

历修府志对尚武好斗民风的表达，主要受府志作者对赣南民风实态体认的影响。社会治乱的变化和府志作者身份的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规限着这一体认及其表达。于是，在对尚武民风的表达中，除了强势的王朝话语，我们也偶尔能见到抹上了地方情结的地方话语。只不过相对前者，后者总是处于隐性的状态和弱势的地位，因而标示着这两套话语之间存在的张力。所有这些，又正是尚武好斗民风图景的强弱在历修府志中有所变化，但相对崇文向学的民风图景则始终占据强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历修府志对崇文向学民风图景的构建，主要是通过挖掘和组合地方美好的历史人文资源得以完成，其动机是藉以激起榜样的力量以推行王道教化。在这层意义上，崇文向学的民风图景，既是府志作者对赣南历史人文已然世界的白描，又是对地方民风应然世界的表达。与构建尚武好斗民风图景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崇文向学民风图景的构建又暗合了地方话语的需要，因为它不仅可以是王朝话语藉以展布教化的范本，又可以成为地方话语展示地方形象的窗口。在这里，王朝话语与地方话语共享着相同的地方人文资源，其话语边界也因此得以模糊。这一特点，可以比较有效地解释崇文向学的民风图景在历修府志中较之尚武好斗的民风图景变化相对较小的现象。

历修府志对赣南尚武民风成因的不同诠释，同样折射出地方话语与王朝话语之间的张力与契合。在王朝话语的视野下，更多的是采用文天祥式的“去南渐近”而疏于王化的理论模式来加以解读，多强调赣南“山驱水激”、“得天地阳气之偏”等自然因素对尚武民风的作用。而地方话语则更愿意从人事的角度来分析，多强调昔日的“干戈征战”所造成的影响。将尚武民风归结为闽粤移民带来的“蛮蛮之习”，既表明王朝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的默契，又表明历修府志的话语权主要为赣南土著所掌握，在这层意义上，这一诠释又溜向了族群话语。

当然，历修府志对赣南尚武民风的诠释，又映射出赣南地方社会丰富的历史内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明代中后期赣南地域社会的战乱与动荡，看到了清初闽粤移民与赣南土著间的矛盾与斗争，看到了清中叶以降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对政府控制的挑战与冲击。在这层意义上，历修府志对赣南民风的表达，又成为我们藉以钩沉那段重要历史和集体记忆的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出发，并带着谁在编方志、谁在看方志以及方志是怎样编成的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地方志作为一种文本，其中暗含了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其中既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也有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既有民众与精英的利益关系，也有土著与移民的利益关系。注意到这些利益关系，我们就不难发现，地方志既是国家权力管控地方社会的文化渠道，又是地方社会标明自身存在的象征符号；地方志既是整个地方社会的形象与名片，又是其中不同利益共同体的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源。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地方志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必须客观地描述和诠释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它又无可避免地要对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进行符合一定利益关系的构建。

陈支平曾指出，外界的干扰造成了区域研究对学术的偏离¹。事实上，自觉增强对地方志这一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基础文献的批判，发掘其中暗含的权力关系和利益诉求，又何尝不是

¹ 参见陈支平《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学界应继续努力的方向。陈春声也指出,在区域研究中,不少研究者热衷于对某种区域社会的特性做简明易记却又似是而非的概括¹。笔者认为,除了外界的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其所据以概括的地方文献缺乏必要的批判,因而也就没能真正把握其文本内涵而导致误读误解。当然,其结果只能是与学术追求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陈炜祺)

评审意见: 明清时期的江西南安、赣州二府,也就是当年的“南赣地方”、今日的“赣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和族群构成、民情风俗,以及近世以来发生的种种变故,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地域社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地区,并已有多项重要研究成果问世。

论文在充分关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从明清时期多次修撰的《赣州府志·风俗志》入手,对“崇文向学”和“尚武好斗”两种看似相悖却密切关联的地方风尚进行了解读。但文章并未刻意考辨有关民风记载本身的虚实真伪及尺度把握,而是力图将这些记载置于社会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下,从谁在编地方志、谁在看地方志,以及地方志是如何修撰而成三个层面,探寻明清地方志对当地民风民俗描述的一般情状,指出,这些描述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修志者的身份和立场;二、当时当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秩序;三、修志者试图向读志者传递何种信息、哪些人群属于他们假设的读者?这样,文章一步步揭示出地方志文字表述中所掩盖的或潜在意识和目的,也一步步逼近当时的真实历史情状;同时也告诫研究者在利用地方史志进行研究时需要警惕的问题,以免与历史的真实、与科学的研究“渐行渐远”。

类似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地方志的编撰和解读中,也存在于所有的文献记载,包括国史和家谱之中,这就使得本文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当然,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文献“批判”方法并非本文作者和他的“受启者”的新创造,而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家法”或传统。但在不少学者那里,这种传统已经被淡忘。

评审专家: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¹ 参见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Japanese war: the type of describing re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type of reflecting the war. In fact, there are a few reflective movies on the World War II in China. In Europe and mainly in the US, movies on that war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nti-fascism. However, Chinese movie directors have no deep anti-war perspective. The essay argues that it is only the fascist essence of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its reasons are deeply disclosed, the aim of anti-war may be achieved. Anti-Japanese war, anti-fascism, anti-war are three processes to realize that war. For Chinese, the process of anti-fascism is more important.

Keywords: World War II; Movie; Anti-Fascism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est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in Late Qing Dynasty

Xiong Yuezhi (115)

Abstract: In late Qing dynasty, three groups played main roles in spreading west learning, that is, foreign missionary, other foreigner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official institutions, Chinese folk intellectuals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These three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because of different standpoints and different activity periods,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ir value orientations of spreading west learning.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was a utilitarian preference in official institutions whose interpretation work was for useage, so that it emphasized on techn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 despised humanities and basic theory. Such shortcomings were made up by missionaries, other foreigner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Thus missionaries could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ose interpreters in official institutions, to some extent, influenced the content of west learning spreading. After 1900, Chinese private capita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uch spreading process, while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missionary power were inferior by comparison.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West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Value orientation

On "Revealing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Wu Guoyi (123)

Abstract: "Revealing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put forward by Sima Guang, is one of the two main tenets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Zi Zhi Tong Jian).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fate of the nation". Sima Guang laid much emphasis on reveal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people's life, which composed the main content of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and the basis of his historical thought.

Keywords: Sima Guang;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Narrative; Livelihood; Historical thought

On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ism in Earlier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e Zhuang (136)

Abstract: In earlier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testantism made a great development, protestant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church were rising. Protestantism institutions and clergymen were both larger than before. The outside image of Protestantism changed in such transitional society. By combining with other social groups, the inside potential of Protestantism developed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movement which tried to make Confucianism as national relig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ovement guided by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was in fact a huge missionary work. However, it was soon against by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the intellectual group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was the large-scale missionary work that directly led to an anti-Protestantism movement.

Keywords: Earlier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testantism; Image change; Missionary work; Movement of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tidubusiness and Bellicosity: Statements of South Jiangxi's Folkways in *Gan Zhou Fu Zhi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Li Xiaofang* (149)

Abstract Folkway is a general topic in all kinds of local chronicles. In *Gan Zhou Fu Zhi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tudiousness (Chong wen xiang xue) and bellicosity (Shang wu hao dou) were two main folkways which responded the author's realization about the practical folkway of South Jiangxi. Also reflected the prejudice and expectation at that time. The subtle change of depiction and annotation not only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social situation, but also indicated the complicated interest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society, relations among local societies, the elitist and the mass native people and emigrants. The local chronicles were multivariate discourse, which decided that the local chronicle will not only present local societies' facts, but also to some degree imagine some folkway statements.

Keywords Local chronicles; Discourse power; Studiousness; Bellicosity; South Jiangxi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and Inner Tension of literary Relation: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1949-1976*Yang Yang* (160)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ummarize literature from 1949 to 1976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ideology and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isclose the historical request to literature and art by social ideology structure, and to indicate the complex situation led by such request.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at period shows its strongest national concien.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principle of free crea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were often unable to adapt to such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way. They showed antipathy, which inevitably led to the tens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deology.

Keywords Chin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ocial life; Rel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e Connotation: From Paris EXPO to Shanghai EXPO*Yang Jianbing* (173)

Abstract Seven expositions were held in Paris. They all focused on and are good at innovation, art characteristic, communication and standard. Those expositions provided some experiences which Shanghai exposition should draw on as reference. The essay argues that under the topic of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Shanghai exposition will held exposition forums and cultural shows. Shanghai exposition will also carry on and develop the expositions' theme, make exposition's standard more perfect. And it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make Shanghai exposition to be a distinguished one which is able to integrat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e connotation.

Keywords Paris; Shanghai; Exposition

On Gao Shi's Family and His Early Life: Centering on Gao Chongwen's and Gao Yi's Epitaphs*Qiu Luming Tang Wen* (179)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Gao Chongwen's and Gao Yi's epitaphs offer us some valuable historical records on the study of Gao Shi,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ets in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in the past, the essay reexamines the birth year of Gao Shi by us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s. The paper discusses about the official experience and marital status about three families in Gao Shi's clan, that is Gao Chongwen, Gao Chongde, Gao Chongli. It offers some new conceptions on Gao Shi's early life, official experience and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mily.

Keywords Gao Shi; Epitaph; Family lineage; Official experience